

兵家管理文化的流变与特征

李桂生

摘要：兵家管理文化经历了氏族制社会早中期的孕育、氏族制社会晚期的萌芽、夏商西周的雏形、春秋战国的形成与发展、秦代的毁灭与劫难、两汉的复苏与定型、魏晋南北朝的低迷与委顿、隋代的承续与过渡、唐宋的中兴与繁荣、元代的断层与沉寂、明至清中后的强化与总结、近代的沉暮与开新等历史流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兵家；管理文化；历史流变；时代特征

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就是政治文化与兵事文化，而其中的政治管理文化与兵事管理文化由于带有浓厚的权谋属性，又是最受世人推崇与称道的。文化史家姚伟钧先生说：“管理文化其实就是管理中的文化意蕴，是文化特征在管理中的体现。”^{[1](P7)}兵家管理文化，实际上就是关于兵事管理的规范与调控、目标实现的手段与艺术的文化。对兵家管理文化的流变与特征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对兵家管理文化进行宏观把握。

一、兵家管理文化的孕育——氏族制社会早中期

严格说来，在氏族制社会的早中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只有在氏族部落之间发生的相当于现今民间械斗之类的暴力冲突。因

此，也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兵家管理实践与兵家管理文化。早中期氏族社会的暴力冲突，是战争的萌芽，其计划、组织、指挥、协调等简单的兵家管理活动与处于萌芽状态的兵家管理意识，是兵家管理文化产生的前奏。在这个阶段，简单的兵家管理活动，与战争本身一样，是一种自发的、本能的行为，缺乏一定的管理思想与管理规则作指导。

在兵家管理文化形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兵家管理意识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自发性。氏族社会人群按照血缘关系，为求得生存而聚为一族，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防御自然灾害与外族入侵，氏族成员一律平等，是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阶段的管理完全出于人的自发的本性，没有管理的自觉，一切随事而生，随事而终。

第二，混沌性。处于萌芽状态的兵家管理意识是模糊的、朦胧的、不明确的，是一种原始、混沌的管理。

第三，盲目性。由于氏族社会人群对自然和社会没有足够的了解，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无法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其管理往往目的不明确，表现出较大的盲目性。

第四，随意性。早中期氏族社会人群尚未创造出人类文明，其心智尚未开发，饥而食，渴而饮，一切率性而为，依本能行事，人性结构中之动物性居主要地位。

第五，潜在性。早中期氏族社会人群在意识里并不知道有所谓的管理存在，不管是渔猎、采摘，还是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都

并不十分清楚其命令、指挥、协调、控制等就是管理。因此，管理意识潜存于人们的生产实践、日常生活和军事行动之中。

二、兵家管理文化的萌芽——氏族制社会晚期（黄帝、尧、舜、禹）

从内容说，兵家管理文化萌芽于战争管理；从时间说，兵家管理文化萌芽于氏族制社会晚期。黄帝时代，战争已很频繁。一般的中小规模战争，其目的大多是为了争夺土地资源与人口资源，发展到后来的大规模战争，其目的就已变为争夺部落联盟统治权了，表现出一定的政治倾向。在古书中有记载的氏族社会晚期的战争主要有蚩尤与炎帝的战争、炎帝与黄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这些是上古最早的战争。

黄帝、尧、舜、禹时代，是氏族制社会后期，也是由氏族向国家转变、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时期。这时期没有常备军队，军事活动由氏族领袖率领本族善战者进行，往往是临时召集，属于兵民合一性质的武装力量。所用的兵器主要以木石为主。这时虽然已能驯养牛马，用之驮载重物，但是没有牛车、马车用于作战的现象。在战场上这时还没有出现车兵、车战，唯一的作战方式是徒兵作战。

黄帝、尧、舜、禹时代，粗浅的、朴素的兵家管理观念已经产生。由于我们没有发现氏族制社会后期的文字记录，其历史是靠后人的片断记载与传说保存下来的，所以其管理思想也是从片断的记载与传说中概括出来的。具体说来，这个时期的兵家管理有以下特征：

第一，组织结构上，在氏族部落实际已有基本的管理组织，设置了不同的职能部门，有专门的部门官员，管理组织是金字塔型的科层结构。

第二，思想观念上，敬重神灵，借助超自然的神异力量进行管理，黄帝、蚩尤等部落首领也被神化。

第三，管理策略上，有朴素的辩证意识，表现为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后发制人，譬如舜用怀柔政策使三苗臣服，以德化为先导，以武力为后盾，采用威慑战略屈人之兵。

第四，管理战略上，重视管理的正当性与民众基础，出师之前，要举行誓师大会，宣布出兵的决定，说明出兵的理由，授予将帅征伐不佞的权力，历数征伐对象的罪行。

第五，管理方式上，政治管理与军事管理合而为一，没有严格的区分，政治领袖与军事领袖一身二任。

第六，管理过程上，基本具备决策、计划、指挥、执行等环节，但是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关系模糊。

第七，组织行为上，表现为内仁外暴、内协外争，这种特征不是其管理理念所致，而是氏族部落生存与发展需要所致。

第八，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军事民主制，推选作战勇敢、有号召力的英雄人物如氏族领袖，来指挥战争。

三、兵家管理文化的发端与雏形——夏、商、西周

夏朝是中国由氏族制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的时期，有四百多年历

史。商朝是继夏之后奴隶制度得到发展的时期，有六百多年历史，社会的各个方面有长足进步。西周是奴隶制的强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顶峰，有二百多年历史。

在夏、商、西周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每个朝代政权的确定都是经过激烈的战争取得。不管是夏启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还是商汤灭夏，抑或周武王灭商，还是政权建立之后对异己力量和周边方国的征伐，都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

战争实践锻造了军事技术与战争艺术，兵家管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夏、商、西周时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军事家，但是思想流派意义上的兵家尚未诞生。这些军事家主要出现在商与西周时期。夏代君主如启、相、少康、杼等，虽然有一些征战的功绩，但在军事思想与兵家管理上更是少有发明，与商、西周相比，显然单薄得多。商朝军事人物主要有商汤、伊尹、武丁、妇好等，其用兵思想在甲骨文及其他文献中有一些记录。西周时期，主要的军事人物有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太公姜尚、周公姬旦，他们都是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创举的人。

夏、商、西周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是兵家管理文化的发端，是承继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代朴素的军事管理观念而来，并用文字记录下来。在这三个阶段，思想文化有不同的特征。夏、商时期天命鬼神思想非常流行，而西周虽然也信奉天命与鬼神，但是开始注重人事，认为上天只护佑有德之人。在战争中谋诈手段的运用也是逐渐增多的，夏比前代更注重计谋的使用，商、西周比夏又有过之。西周时

期是奴隶制社会的强盛期，文化也比前代更加发达，更加注重礼乐教化，这在军事上也有反映。

总的说来，夏、商、西周的兵家管理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虽然天命鬼神思想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也注重人谋与人事。人们笃信上帝、神灵，常以占卜来决定军事行动，同时重视民心向背、人才选拔与培养，重视军事力量的加强以及时机的捕捉。

第二，巫师是沟通天人的媒介，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力量，在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三，管理组织体系比前代更庞大、更严密，金字塔型的科层制度更完善。

第四，管理带有很强的阶级性，目的是为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与保障奴隶主阶级在军事上的胜利。

第五，管理客体系统更复杂，管理对象更多样，分工更细密，要求管理主体具有更高的管理智慧与管理技巧。

第六，管理手段上比前代更加注重赏罚和激励机制的使用。

第七，作为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人，等级关系严格，而且与出身的高低贵贱程度密切相干。

第八，出现了兵家管理文献《军志》、《军政》、《司马法》等，这说明兵家管理开始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与发展。

第九，决策、计划、执行、指挥、协调、监督等职能有比较明确的内涵与界限，环节区分清楚，关系更为明晰，有分工，有合作，比前代更具进步性。

第十，在管理体制上，抛弃了前代的军事民主制，实行军事集权制，军事管理与军事组织可以是松散或分散的，但是军队调动权掌握在周天子手中，政权与军权紧密结合。

第十一，在管理理念上，注重天人关系的和谐，逐渐抛弃了对自然、社会的神话性解释，科学文化知识等比前代有更多的积累和更大的发展，取得了较高成就，逐渐从关注天神转向关注人事，从虚妄转向现实。

第十二，管理思维上，由混沌、朦胧向明朗、清晰转化。

第十三，氏族制社会晚期兵家管理的潜在性特征此时逐渐消失，外显性特征逐渐突出和明朗，有专门的军事管理机构与管理人员。

四、兵家管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春秋战国

春秋末期《孙子兵法》的诞生标志着兵家管理文化的形成，战国时期兵家人物与兵学著作的涌现表明兵家管理文化有很大发展。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有一百八十二家，但是只著录了三十五家，东汉班固著录在《汉书·艺文志》的兵书有五十三家，其余的都没有著录，可见选择标准之苛刻。可以肯定，在六国之时兵书数量一定很多，应该是汉初的几倍以上。张良、韩信没有全部整理、著录汉初能够见到的一百八十二家兵书，而是选取其

中的三十五家，致使大部分兵书失传，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另外，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具有伟大成就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孙臆、吴起、尉缭子等。这是军事与政治进一步分离的结果，也是军事相对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结果。

总体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兵家管理文化已经形成，在管理上表现出与过去不同的特色。

第一，春秋战国的兵家管理思想是在地主阶级上升过程中和军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服务的，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阶级性。

第二，管理组织基本沿袭西周以来的体系，但其性质不同，是奴隶主阶级向地主阶级专政转变的组织体系。

第三，管理主体系统的人与管理客体系统的人虽然也有等级之分，但是有了很大的改观。奴隶制度下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人，只能依据出身确定其地位，比如国人可以当兵，野人不可以当兵。春秋战国时期则打破了这种制度，野人不仅可以当兵，而且可以通过战功获得官爵，可以进入管理主体系统。

第四，更加重视谋略在管理中的运用。春秋战国是谋略形成与发展的时代，兵家权谋类著作就是中国古代的谋略学著作。我们只要讲到兵家，就会想到谋略，以致常常以谋略学代替全部的兵家学说。

第五，军事领导体制承袭夏、商、西周以来的君主集权制，不过性质不同。夏、商、西周是奴隶制度下的君主集权，春秋是由奴隶制

度向封建制度过渡的君主集权，战国是封建制度下的君主集权。

第六，管理的决策、计划、指挥、协调、监督等职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一定时期有了更加明确的分工。夏、商、西周时代的军事决策权与指挥权往往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而春秋战国时代两权适当分离，君主是主要决策者，但有时候也亲自率军出战，更多的时候是把军队交与将帅指挥。春秋时期已有专职监督人员，齐国司马穰苴处斩监军庄贾就是例证。计划权在兵家管理中就是谋划权，在春秋战国已有比较庞大而健全的职能系统，职能系统中就有参谋系统和协调系统，这些在《六韬》里已有记载。夏、商、西周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军事谋划系统大体上一致，主要靠军师出谋划策，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专门的智囊系统，比夏、商、西周更专业、更庞大、更全面，更加重视谋划的民主性与广泛性。此外，协调、监督系统也更完善，分工更细密、更明确。

第七，在管理理念上，重视天、地、人的和谐统一，重视管理生态的谐协与平衡。

第八，在管理流派上，基本可以分为唯物与唯心两大系统。属于唯物系统的，有兵权谋类、兵技巧类、兵形势类；属于唯心系统的，有兵阴阳类。这两个系统的兵家管理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中都有运用，但从《左传》、《战国策》、《国语》等先秦文献中有关战争的记载看，唯物的管理思想是主流。

第九，神鬼观念在兵家管理中虽有一定影响，但比前代有很大削

弱，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更加关注人事，特别重视人在管理中的作用，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2](P170)}的管理命题。

第十，出现了以绩效考核为主要内容的目标管理模式，根据杀敌多少，计算战功，授予爵位，赏赐土地，分配奴隶。西方的目标管理在二千三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纪才出现。

第十一，这时期的兵家管理吸取了其他诸子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管理思想，比起其他的诸子管理，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更广的适用性。

五、兵家管理文化的毁灭与劫难——秦

秦朝是兵家管理文化遭受毁灭与劫难的时期。兵家管理文化在秦朝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几乎遭受灭绝的厄运。

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封建集权制王朝的诞生。它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纷争与动荡的历史，使中国得到了短暂的统一。在思想文化领域，各国的文字、度量衡也被统一，甚至习俗也在统一范围之内，彼此阻隔的地域文化得到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产生于六国统一前夕、为嬴政君临天下提供治国理论的《吕氏春秋》正反映了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构想。但是，嬴政做了皇帝后，继续施行暴政，濫用法家学说，对不同流派的思想文化没有采取包容的态度，而是采取剿灭政策——焚书坑儒，使发达的先秦文化遭受了空前的劫难。有秦一代，不仅是只延续了十五年的短命朝代，而且也是思想文化极度贫乏与委顿的朝代。

秦代兵家管理在理论上没有发展，但其管理实践仍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秦朝建立之后，没有调整管理方略，仍然承袭并灭六国时期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暴力管理。

第二，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兵家管理主体系统。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的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朝代，与此相适应，其军事管理也实行高度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这种管理制度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效仿，沿袭了二千多年。

第三，在管理客体系统中，扩大了基层士兵的来源。在有大战之时，常把刑徒、流民、商贩等编为士卒，以补充兵员之不足。

第四，在管理组织系统中，基本上承袭六国时的组织体制，并有所增益与完善，实行高压态势的科层制管理。

第五，在管理行为上，表现为好大喜功、重武功、轻文德，最终导致管理失范，体系崩溃。

第六，作为管理主体的人和作为管理客体的人，角色功能绝对化、极端化、凝固化，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导致二者之间矛盾激化，管理职能无法正常履行。

六、兵家管理文化的复苏与定型——两汉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只有儒家受到当政者的重视与利用，其他诸子则被罢黜。从哲学史来说，作为子学意义的诸子学至此终结。儒家在思想文化上占

据统治地位，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

在汉代，朝廷虽然没有设立兵学博士或武学博士，兵学不是官学，但是当政者非常重视兵家著作的整理，汉代曾经多次搜集与整理兵家著作，并分为四类，这对兵家管理文献的保存与流传具有重要意义，是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

汉代是继秦朝之后封建的中央集权制朝代，它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没有采取对诸子学说完全禁毁的政策，只是罢黜不用而已。儒学逐渐成为经学，诸子学说失去了发展的土壤与环境，兵学虽不再如先秦一样蓬勃发展，但也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平缓的发展中定型，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兵家管理理论体系。

汉代出现了许多军事家，但是并没有出现相应数量的兵学著作。汉代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原创性兵书《三略》。《三略》题名为黄石公所著，成书时间大概在东汉末年，以儒家大一统思想为主导，杂以黄老道家与法家思想，广泛地吸取了先秦兵家的思想养分，《孙子》、《吴子》、《尉缭子》的思想在其中均有反映。它既是一部兵书，也是一部政书。这种思想倾向很清楚地反映了汉武帝以后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治国理念，以安治天下为主旨的思想风尚，一反先秦兵书所表现的扩张、进攻、速战的思想格调，呈现汉代儒学的气象。这标志着中国兵家管理文化的定型——以儒统兵。儒家思想过去在兵家著作中只是诸多思想之一种，在汉代则一变而居于主导地位。由汉迄至清代两

千余年的兵家管理思想，均呈现此种特征。此外，汉代也有文人论兵的篇章，如《淮南子·兵略训》，晁错《言兵事疏》，王符《劝将》、《救变》、《边议》、《实边》等，都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兵家管理思想，是兵家管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的兵家管理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管理主体系统中，强化了帝王在兵家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完善了中央集权的军事统御体系，军队的征调、将领的任免、武库的使用等决策权均掌握在皇帝手中。

第二，儒家思想强力渗透到兵家之中，逐渐成为兵家管理的主导思想，是兵家管理文化定型的主要标志。兵家管理文化仍吸取了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只是这些思想逐渐地被儒家思想所改造与融化。

第三，汉代的兵家管理，比起先秦、秦代，具有一定的人性化倾向，大规模坑杀降卒、杀害俘虏的现象基本上得到遏制。

第四，管理主体系统中的将帅逐渐由儒将取代，这是汉代实行儒家政治的必然结果。汉代倡导儒家经学，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通经致仕是当时读书人成就功业的主要途径。朝廷以及地方各级职位逐渐由儒官把持。这种选官、用人制度不能不对兵家管理产生影响。

第五，管理主体系统与管理客体系统都比以往庞大和复杂，这是由于汉代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更趋专门化所致。

第六，谶纬迷信在管理思想上也有反映，并渗透到了兵家管理活动中。《汉志》著录的不少托名先秦政治家与军事家所著的阴阳类兵

书，实际上大部分产生于两汉时期。

七、兵家管理文化的沉寂与委顿——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兵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低谷期。南北朝时期虽然出现了不少编纂性质的兵书，表现出虚假的繁荣。司马彪《兵记》、孔衍《兵林》、葛洪《兵法孤虚月时秘要法》、宋高祖《兵法要略》、梁武帝《梁主兵法》、梁元帝《玉韬》、刘佑《金韬》、王略《武林》、宇文宪《兵书要略》、伍景志《兵书要术》、许昉《军胜见》、陶弘景《真人水镜》、赵甗《战略》、萧吉《金海》、王宜弟《兵法孤虚立成图》等大多属于阴阳、星占、术数之类，并无管理思想方面的价值。真正原创性的具有较大价值的兵学著作只有诸葛亮的《便宜十六策》、《将苑》以及司马彪的《战略》。此外，有曹操对《孙子》的注释、贾诩对《吴子》的注释，他们开启了兵学研究之路。

魏晋南北朝的兵学表面繁荣，实际上处于委顿与沉寂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但与春秋战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完全不同。春秋战国时期，士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当时的社会为士阶层晋身上层官僚集团、建功立业提供了条件与机会，打破了官僚的世袭制度，选贤任能成为社会风尚。战国时期的地主阶级急需大量的才俊之士为他们出谋划策、冲锋陷阵、摇旗呐喊，而士也正需要这样的舞台与机遇，所谓风云际会，英雄辈出。但是，魏晋时期，士族阶层是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大阶层。士族与庶族

相对立，上层社会世袭官职、爵禄，不劳而获，不学无术，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而庶族阶层却无晋身之阶，才具被扼杀。这种状况抑制了人们的创造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是这个时期兵学没有发展、兵家管理文化没有创新的根本原因。

第二，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局变化频繁，但与春秋战国有本质的不同。春秋战国，政治多元，诸侯逐鹿，鹿无定属，战争多来自外部。三国归晋之后，虽有来自外族的侵扰，但动乱多来自内部。这种政治局势决定了兵学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因为其社会矛盾多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争权夺利的内讧与钩心斗角，阶级与阶层结构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第三，东汉末年，政局混乱，社会动荡，天下汹汹，处于忧虑与煎熬中的不同阶层的人都希望得到解脱。道教应运而生，佛教得以传入中国。宗教的兴起与传播，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使人们由现实转向对神仙、佛土的追求，逃避红尘，消极地应对现实。从天子到官僚贵族，到黎民百姓，关心的仍然不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而是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

第四，魏晋玄学的清谈风气使人们关注抽象的玄理，而不是现实问题，所谈之事不是经天纬地、治国理军、改善民生，而是摩玩玄远的精神游戏。清谈之士位居高层，身膺要职，却精神空虚，崇尚虚无，漫谈玄理，不屑时务，以致国难当头而束手无策。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官僚既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又遑论有卓越的兵学成就！

第五，佛、道二教的传播，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一定程度上促使阴阳、星历、占卜、术数等大行其道，并渗透到兵学之中，以星占、卜筮预测战争，为战争决策提供依据，把兵学引向迷信与庸俗的道路，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那些兵阴阳书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在兵家管理方面没有什么积极价值。

魏晋南北朝兵家管理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指挥权属看，实行分级管理，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分别归中央和地方管辖。

第二，从集兵制度看，多种集兵方式并存，有征兵、募兵、世兵、府兵等多种制度。

第三，从学术倾向看，这时期的兵家管理文化有两个取向：一个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主流兵家管理，另一个是受道教思想影响比较大的非主流兵家管理。前者以曹操、诸葛亮、司马彪等人的兵法著述为代表，后者以葛洪、陶弘景、王宜弟等人的兵法著述为代表。

第四，从历史阶段看，魏晋时期儒家思想仍是兵家管理的主导思想，且比汉代有所强化，表现为忠、信、仁、义等思想在兵家管理中占突出地位；南北朝时期道教对兵家管理文化影响比较大，表现为阴阳、星占、望气、数术、符篆、科仪等在兵家管理中的运用。

八、兵家管理文化的承续与过渡——隋

隋朝于公元五八一年建国，于六一八年灭亡，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隋代承续南北朝兵学委顿的余绪，没有什么创造，但是开启了唐

朝兵学的复兴，是一个过渡时期。有隋一代，虽有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杨素等名将，但是并无兵法著述。隋代建立了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废除了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为唐朝以后武举制度的实行和兵学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隋代兵家管理虽然缺乏理论方面的建树，但在实践上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改变了北周以血缘、族缘、姓缘关系统兵的旧制，恢复了军队将士各自的姓氏，取消了私兵、族兵制度，改造乡兵为中央兵，加强了朝廷对军队的统属与管辖。

第二，隋以前的府兵，军人及其家属编入军籍，与地方无关。隋朝则加强了对府兵的控制，使府兵受到来自军队与地方的双重管理，把府兵的户籍编入地方，战时出征，平时务农，是兵农合一的职业军人。

第三，在组织体系上，完善了卫府制度，设立十二卫、十六府，以卫领府，是府兵制度的成熟期。

九、兵家管理文化的中兴与繁荣——唐、宋

经过秦汉以来八百多年的缓滞与委顿，在唐、宋二朝迎来了兵学的复兴。

唐朝的兵学家以李靖、李筌为最著名，兵学著作以《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阡外春秋》为代表。整个唐代兵学，以此两人及其兵学著作而光彩夺目。李靖生活于隋末唐初，隋朝名将韩擒虎为其舅父。

李筌生活于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恰值中唐之时。这些著作融会诸子百家之言，思维开阔，气势恢宏，论述精到，有独特的思想体系，为后人所赞赏。亦有以道家统兵者，如活动于宪宗时期的王真著有《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把《老子》视为兵书，发掘其兵学要义，体现其道家兵论的倾向。

此外，唐朝尚有文人兼通兵学者，如杜佑修纂《兵典》（《通典·兵典》），记述历代兵制，列举用兵方法；赵蕤撰写《兵权》（《长短经·兵权》），以儒论兵，史论结合；杜牧注释《孙子》，征引古代战例，多为剴切。

宋朝的兵学在唐朝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宋朝是一个文化、经济、科技都很发达的朝代，军功战绩虽无可称道，但兵学文化颇为耀目。宋太祖继承唐代太宗朝的做法，设立武庙，即太公庙，并亲往拜谒。宋代仁宗朝沿袭唐代武周以来的武举制度，对应试士子进行骑射、枪法与兵法的考试，以此选拔将才。仁宗还设立与推行武学，神宗朝对武学制度有较大的完善。武学隶属国子监，有武学教授、博士、学谕等职，专门教授兵学理论与武艺，阮逸、何去非、施子美、魏了翁、王应麟等人都曾经担任武学博士。

兵家著作在汉代虽有称作“经”者，如《张良经》、《握机经》，南朝宋代也有“兵经”之称，晚唐有“武经”之称，但都泛指兵学著作，并非具有“兵家经典”的含义。宋仁宗诏令编纂《武经总要》，兵学著作开始列入“经”的范畴。宋神宗元丰年间，诏令纂修《武经

七书》，并颁行天下，作为武学教材与军官的必读书。神宗皇帝不仅在朝廷设置武学，把武学列入官学范畴，而且把《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唐李问对》等七书列为兵家经典。

兵学在宋代备受朝廷重视，由私学步入官学殿堂，在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中原的政治、军事环境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涌现出《何博士备论》、《虎铃经》、《十七史百将传》、《百战奇法》等兵家名作，也产生了《历代兵制》、《补汉兵志》、《文献通考·兵考》等兵制研究著作。宋代是中国兵学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一个繁荣时期。虽然兵学的繁荣未能挽救宋朝的覆亡，但是对兵家管理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与推动的作用。可以说，宋代是兵学文化高度繁荣而军事能力极度贫弱的一个朝代。

唐宋时期的兵家管理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领导体制上，唐朝适度分权，宋朝高度集权。唐朝军权虽然名义上在朝廷，但是各封疆节度使势力坐大，各自为政，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以致造成“安史之乱”。宋朝为了避免出现唐、五代以来武人拥兵自重、藩镇割据一方的现象，把军权收归中央，加强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实行“将从中御”的策略。

第二，在主导思想上，唐、宋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所不同的是，唐朝兼容性更强，道家思想在兵家管理中有一定反映。宋代则是儒气过重，儒学观念对兵家管理有着强力渗透。

第三，唐宋时期的兵家管理，更加重视文人在兵家管理中的作用，实行以文制武、以文统武的管理体制，宦官监军与文官统军是管理体制上高度集权的主要表现。

第四，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相关，宋代更加注重管理客体系统中的技术因素，如兵器使用、筑城技术、攻守器械、火器制造、地图制作等，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主流兵学“重道轻器”的倾向（非主流兵家著作中有《墨子》对军事技术的重视与应用）。

第五，唐宋把军事教育与培训纳入到官学体系，实行正规化管理，开办武学和武举，重视武学人才培养、选拔、使用、考核等环节的管理。

第六，兵家管理理论的强劲与兵家管理实践的菱弱形成一种反差。这是宋代特有的现象。

第七，在兵家管理思想中，民族英雄主义精神有一定体现，但是在兵家管理实践中却贯彻消极防御的战略意图。

十、兵家管理文化的停滞与断层——元

元朝是蒙古族统治中原的朝代。元朝虽然在思想文化方面采用儒家学说作为主导思想，也笼络了一批汉族的上层人士为之效力，在开国君臣中，涌现出众多著名的军事家，如成吉思汗、忽必烈、史天泽、伯颜、木华黎、拔都、速不台等，杰出将帅不下百人，可谓将星璀璨。蒙古族人创造了以骑兵为主的战术战法，但是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兵学著作，现存兵书只有几部无关紧要的阴阳、星占类著作《神机制敌天

书白猿经》、《戎事类占》等，没有什么思想价值。可以说，元代是一个兵家管理文化停滞与断层的朝代，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尚处于奴隶社会，文化落后，凭着剽悍灵活的骑兵战术纵横天下，对中原文化虽有吸收、利用，但是重视不够，没有深入地学习、研究与普及。

第二，元朝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把各族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维吾尔人、西域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第四等是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族人）。旧朝遗留下来的汉人社会地位最低，最受压迫、剥削和歧视。不同等级的人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当然，元朝的根本问题仍是阶级对立问题。汉族也有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蒙古族也有受剥削者、受压迫者。民族歧视和高压政策的实行，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包括兵学文化的发展。

第三，元朝是宗教盛行与繁荣的朝代，对宗教采取优待与提倡政策，不仅佛、道二教盛行，而且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也很盛行。宗教的盛行把人们的思维转向了超理性的精神世界，对理性的兵学文化起着一种间接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发展。

第四，元朝将领中绝大多数为蒙古族人，虽有战争实践经验，但是鲜有著述能力；汉族将领虽有著述能力，但处于为异族政权效力的

矛盾心境，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也鲜有著述。南宋治下之遗民，地位低贱，则多不愿为新政权效力。由于没有固守天下之热望，自然没有治国用兵之谋谟。

第五，元朝的社会矛盾多为国内阶级和民族矛盾，虽然元朝统治者在各地设立防范人民反抗的驻防军，但是人民起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虽然内战时有发生，但毕竟不是为抵御外来侵略而战，难以推动兵学的发展与催生兵法的创新。

元代的兵家管理有以下特点：

第一，实行严格的民族歧视性质的等级管理政策，在编制上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蒙古军全部由蒙古本族人组成，是元军的主力部队。探马赤军是从蒙古、色目两部族中挑选出来的，是元军中的精锐骑兵。汉军是从广义上来说的，主要由女真族人与汉人组成。新附军主要由南宋的降军组成。这种组织编制与元朝把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四个等级是相对应的。

第二，管理客体系统中的兵种范围扩大，有骑兵、步兵、炮兵、弩兵、水兵和工兵等。

第三，在军事人才的选练方面实行军官世袭制度，导致军队腐败和战斗力削弱。

十一、兵家管理文化的强化与总结——明至清朝中后期

经过元朝一百六十余年的沉寂与断层，兵学文化在明朝至清朝中后期有了较大的发展，是兵家管理文化的强化期，是继唐宋之后的又

一次繁荣。

明中叶以后，在社会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城市工商业比较繁荣，市民阶层扩大，封建社会开始步入后期；在科技领域，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出现了一些科技名著如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李时珍《本草纲目》；在思想领域，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程朱理学是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虽出现了意在对理学进行补偏救弊的王阳明心学，但是也出现了李贽、王夫之、顾炎武、戴震、唐甄、颜元等反理学的思想家；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市民小说《金瓶梅》、神话小说《西游记》、志怪小说《聊斋志异》、梦幻小说《镜花缘》、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揭露官场腐败与社会黑暗的“三言”、“二拍”，以及向往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戏曲《牡丹亭》等。这些表明，明朝至清朝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出现了多元思想倾向，预示着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到了晚期，社会开始孕育着变异的新因素。

与社会发展、思想状态相一致，明朝至清朝中后期的兵学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的表现就是兵学的再次繁荣与复兴。从南宋末年到元朝灭亡的一百六十余年历史中，中国兵学文化的命脉几乎断绝，处于沉寂无声的状态。明朝至清朝中后期兵学再次繁荣与复兴的主要标志是，兵学研究创作得到总结性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兵家研究著作和原创性兵书。据统计，明朝存世兵书共有七百七十七部，清朝存世兵书有九百零八部。^{[3] (P21)}在兵家文献注释方面，

明代出现了刘寅《武经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孙子参同》、朱墉《孙子汇解》；在兵法的创造方面，涌现出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何良臣《阵纪》、《军权》、《制胜便宜》，无名氏《草庐经略》，揭暄《兵经》，王余佑《乾坤大略》，魏禧《兵迹》、《兵谋》、《兵法》；军事百科性质的大型兵学类书有茅元仪《武备志》；军事技术方面，有焦玉《火龙神器阵法》，焦勛《火攻挈要》，郑若曾《筹海图编》，徐光启《兵机要诀》等重要著作。清朝有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年羹尧《治平胜算全书》、魏源《海国图志》、华蘅芳《防海新论》、徐建寅《兵学新书》等。

明朝至清中后期的兵家管理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理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强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兵家管理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明清两朝都注重文官领军与监军制度，明朝还实行太监监军，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对军队的控制。

第三，扩大了管理客体系统中人的范围，在明朝出现了私有武装家丁。

第四，明清在不同的时期，领导体制有所不同。明朝军权高度集中，加强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清朝努尔哈赤推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这是一种军事民主集中制度。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性质发生变化，成为一种参谋会议，又回归到强化皇帝专权的旧制。

第五，组织体系更加庞大与严密，分类分层，条块结合。

第六，教育管理制度比前代完善，武举考试方式、程序与文官科举接轨，亦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

十二、兵家管理文化的沉暮与开新——近代(鸦片战争至“五四”)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紧闭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一九一一年清朝灭亡。近代中国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中国传统兵学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走到了它的尽头。在世界军事与国际政治大潮的裹挟下，中国的军事发生了深刻的全方位变革，主要表现在：废除武举制度，兴办武备学堂，更新武器装备，变革军队建制，借鉴西方兵学理论，改进训练规程，引进西方技术等，逐渐向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近代军事过渡。一些具有远大抱负的爱国之士希望以此拯救危亡的中国，但是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重谋轻技的传统思维、臃肿腐朽的官僚体系、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狭隘落后的思想观念，决定了旧的中国必须经过烈火的焚烧才能重生。

近代兵学著作主要有曾国藩《水陆行军练兵志》、《曾胡治兵语录》，胡林翼《读史兵略》，张之洞《兵学》（《劝学·外篇》之一章），黄冕《炮台旁设重险说》，林福祥《平海心筹》，壁昌《兵武闻见录》，叶世槐《空心炮楼图说》，段祺瑞、冯国璋、王世珍等人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丁守存《用地雷法》，潘廷辉《铸炮图法》，龚振麟《枢机炮架新式图说》、《铸炮铁模图说》，蔡锷《军国民篇》，薛福

成《筹洋刍议》，徐雅荪《洋防说略》，徐建寅《兵学新书》，陈庆年《兵法史略学》，郑观应《盛世危言》，蒋方震《国防论》、《孙子浅说》等。此外，还有军事技术著作，如《防守学》、《测绘学》、《地輿学》、《炮学》等。

近代兵学与兵家管理文化，具有新旧交替、中西杂陈的特点，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兵家管理文化的思想精华，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了西方近代军事科学与军事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兵学理论，已经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兵学，而是近代军事学。

近代兵家管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提倡军人的忠义血性，并使之在兵家管理思想中居主导地位。

第二，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认为要战胜敌人，必先学习敌人。

第三，军事科学技术因素在兵家管理要素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第四，在组织体制上，改革了清朝前期八旗与绿营的世兵制度，创立了近代勇营募兵制度；后来又仿德国与日本，创立征兵与募兵相结合的新军制度，其武器装备、编制体制、训练与作战等逐渐向近代军事过渡，逐渐终结了传统的封建军制与传统的管理模式。

第五，军事教育体制向近代军事过渡，废除武举考试，创办新式军事学堂，当时主要有水师学堂、陆师学堂、炮兵学堂。在陆军学堂

中推行三级军事教育制度，仿照日本设立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大学堂。虽然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在教学中占重要地位，但是近代军事学堂是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目的是培养封建王朝所需的人才，因此经学教育仍在军事教育中起着思想主导作用。

十三、结语

通过考察兵家管理文化的流变和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兵家管理文化呈发展——停滞——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轨迹与螺旋式上升路径：夏、商、西周的雏形——春秋战国的形成与发展——秦代的毁灭与劫难——两汉的复苏与定型——魏晋南北朝的低迷与委顿——隋代的承续与过渡——唐宋的中兴与繁荣——元代的断层与沉寂——明至清中后的强化与总结——近代的沉暮与开新。兵家管理文化波浪式与螺旋式前进与上升的发展规律表明：

第一，自汉武帝开始，在比较强劲的儒家文化作为统治文化的大一统朝代，兵家管理文化一般比较发达，而在思想混杂、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的朝代，兵家管理文化往往转入低迷徘徊，这说明儒家学说并非只有思想禁锢的作用，而且还有强化文化发展的作用。

第二，兵家著作的数量与兵家管理的精细程度总体上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呈螺旋式上升，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亡而终结。

第三，兵家管理文化的发展并不与战争频繁程度成正比，战争频繁的朝代也可能是兵家管理文化贫困的朝代，这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不完全合拍。

参考文献:

[1]姚伟钧.人类社会的调控——管理文化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2]徐勇.先秦兵书通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3]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李桂生(1967-),男,中国江西省宁都县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鄂东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兵学、中国管理哲学。

E-mail:liguisheng89@yahoo.com.cn